

三峡被指沦为利益集团牟利机器：

国人为其缴税超5千亿

3月27日有媒体报道说,24日下午,中共中央组织部一名副部长到三峡集团宣布了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该决定任命了新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免去了曹广品的董事长和陈飞的总经理职务。

媒体马上注意到这个决定的非同寻常之处,有的媒体则干脆把这个决定的反腐背景直接写进了报道的标题。

媒体之所以如此“大胆”,一是根据三峡集团一二把手同时被免这种不常见的现象;二是根据中组部官员在宣布任免决定时,直言不讳地说该项任免决定是“结合中央巡视组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督导组掌握的情况”而做出的,并且要求三峡集团的新任领导层,对巡视中发现的问题要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时间要求,一件一件抓落实,切实落实反腐败工作的主体责任。

媒体报道说,“三峡集团的腐败社会上屡有所闻。去年年底,中央第九巡视组

对三峡集团公司进行了巡视,惊曝腐败几乎涉及各个领域,其中选人用人腐败频遭点名、工程建设招标专案暗箱操作令人惊心”。此外,“巡视发现了三峡集团存在众多问题。包括:领导人员亲友插手工程建设,一些招投标暗箱操作,工程建设项目分包现象比较普遍;有些领导人员违规占有多套住房,存在办公用房面积过大,超标购置公务用车,公务消费存在铺张浪费现象;决策不规范不透明;选人用人工作问题突出,个别领导人员带病上岗,一些关键岗位长期不交流。同时,巡视组还收到了反映一些领导人员的问题线索,已按照有关规定移交中纪委、中组部处理”……

“多家内地媒体近日报道,20多年来,全国人民累计交给三峡工程的钱超过5000亿元,随着三峡工程发电量增加,三峡集团收入节节攀升,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用电方面的便利,三峡沦为利益集团的牟利机器”。

这里所谓“全国人民累计交给三峡工程的钱”,就是指一般老百姓不知道、不注意的暗藏在电费之中(每度电7厘至1.5分)的向国民征收的一种特别税——三峡建设基金。而为一个具体的建设项目而向国民征收特别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仅见。

按照政府有关部门的说法,三峡工程建设完工,就将停止征收三峡建设基金。2009年,三峡开发总公司宣布三峡工程完工,并因此改名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按照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三峡工程的资金投入回报是每年12%以上,因此,当时国家计委对工程的资金回报率要求是12%。由此,纳税人一共为三峡工程缴纳了5000亿元的特别税,每年的回报应该在几百亿元以上,可是,纳税人不仅没有收到一分钱的回报,并且还要继续往三峡这个大漏斗里缴税,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光明网 2014.3.26 文 / 光明网评论员

多名地方官强拆获绰号



李拆城

近年来,因征地而起的流血冲突事件屡屡进入公众视线,记者梳理了部分让人瞠目结舌的案例,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些暴力拆迁事件背后,有着事关开发商、当地政府的暴利作祟。

盘点一 那些和拆迁有关的官员
“拆走一头牛,赔了一只鸡”,一些地方暴力拆迁的最大动力就是暴利。这些年,多名地方主政官员的绰号都与拆迁、城建有关,而他们的辖区也成为强拆冲突事件的高发区。

2009年11月,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村民唐福珍,在面对政府不断逼近的破拆队伍时,一次次举起油桶,把汽油浇在身上,要求停止强拆,对话协商解决拆迁争议,但是拆迁方并没有理会,最终唐福珍选择了在自家天台上“自焚”。而当时的成都市领导就是因为大力推进拆迁而被坊间称为“李



季挖挖

拆城”的李春城。
被老百姓称为“季挖挖”的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在他主政南京的几年内,满城开挖,把六朝古都变成了个大工地。面对“季挖挖”的责骂和高压,有些区县干部只能将任务层层分解,一级压一级,限时限量完成。一些强拆项目,甚至提出底线是“只要不死人,不死在现场,什么手段都能用。”

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孙善武在担任洛阳市领导时,强势推进旧城改造,“别人不好拆迁的地方,只要孙善武一去,就很快拆光了”,因此被群众称为“孙善扒”。而在扒房的过程中,因管理不善,九朝古都的不少文物建筑都被破坏,而洛南地区4万亩耕地被建成了行政区和商品房。

盘点二 那些“极尽能事”的拆迁胆大妄为:在强拆事件中,被拆一方中有人被火烧死、被



孙善扒

铲车碾死、被活埋、被打死的事件都曾被新闻媒体曝光。

2010年10月底,复旦博士孟建伟的父亲孟福贵因遭遇暴力拆迁被害。而同时被打伤的邻居武文元,左手四个指头被打断,全身多处淤青。孟建伟记下了武文元的回忆:“10月30日凌晨2时左右,孟福贵听到有人用挖土机推他家后墙,就来把我叫醒,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就有十来个人翻墙进入院中,把两人打倒在地……”

用亲情人伦攻下“钉子户”:2013年10,因婆婆为拆迁对象,湖南长沙市天心区的小学教师谭双喜收到区教育局通知,将其调往拆迁指挥部工作,直至婆婆签订拆迁协议。

突然袭击“拆你没商量”:2010年5月,,淮安一户人家的两位老人在大白天被一群人强行拖到室外,自家190平方米左右的3层楼房随即被强拆,最后却得到一句“拆错了”的回

复。

强行带走异地丢弃:2010年10月,年过六旬的合肥市民赵良芝正在家门口洗衣服,突然被几个年轻小伙强行拖上一辆汽车后丢弃在城外,身无分文的赵良芝在路人帮助下回到家后,发现自己的家已经被拆得面目全非。

盘点三 那些“我伙立呆”的拆迁雷语

无悔派:四川成都金华村唐福珍案中曾遭停职后又官复原职的成都市执法部门一官员说:“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官的悲剧”;“我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所做的一切只是在执行和捍卫法律。”

推理派:天津市宁河县一官员劝说小学老师张熙玲接受拆迁时说:“你以为浇了汽油,领导就免职了?你浇了汽油,你儿子缺了妈妈,你爸爸缺了儿媳。你算过这账了吗?把谁处理了?处理了又到别的地方去了。”

“傲娇”派:辖区一合法民宅遭遇强拆,面对《城市晚报》记者采访,长春市高新区拆迁办一官员却训斥记者道:“你应该报道高新区如何发展,应该报道老百姓是如何为难政府、刁难和敲诈政府,应该报道老百姓如何不配合拆迁……”

《京华时报》2014.3.30

马来西亚爆炸案中的中共特工

1943年6月底,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在延安召开记者招待会,谴责军统秘遣特务试图暗杀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一时之间中外舆论大哗。破获此次惊天大案的功臣,就是那位曾被毛泽东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的布鲁。

布鲁,真实姓名陈泊,原名卢茂煥,1909年出生于海南琼海的一个渔民之家。192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当地的琼崖工农红军,很快就因作战勇敢、灵活被提升为副连长。到了1928年,由于海南琼崖的革命斗争受挫,陈泊被迫远走印尼苏门答腊岛,次年前往雅加达与马来亚共产党取得了联系,担任了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队长,专门负责保卫、除奸工作,从此开始以布鲁为别名。

1931年,马共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

标被捕变节,亲自带领警察大肆抓捕新加坡地下党员,气焰十分嚣张。马共决定迅速采取刺杀李锦标的锄奸行动,并指令陈泊亲自负责执行。不幸的是,这次本来计划周密的刺杀计划,却因为在酒店等待刺杀时自制的炸弹意外爆炸,导致陈泊脸部、左眼严重受伤,整个左手掌被当场炸飞,昏迷不醒的他也因此被闻声赶来的警察抓捕。

陈泊深知当地警方并不知情,因此在审讯过程中始终咬定炸弹是别人扔进房间,自己只是无辜受害的住客。就这样在案件拖了将近一年之后,当地警方既找不到证据给陈泊定罪,最后只好以“危险分子”的名义,将陈泊解送出境。

1936年年底,陈泊终于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重新取得了联系,并经香港、广东辗转到了延安,成为延安保卫部门的一

名侦察员。

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陈泊,到延安以后很快就显现出了他在谍报方面的天才,屡建奇功,并与中共中央社会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总政锄奸部侦察科科长钱益民一起,被誉为延安情报界“三大奇才”。

据说,有一次陈泊获知,边区保卫部门抓获了一名伪装成《中央日报》记者的军统特务,目的是检查边区临近几个县里潜伏特工的反共成效。敢于冒险,好出奇招的陈泊以假代假,自己冒充军统特务,带着《中央日报》记者证,继续巡视各县。每到一处,当地潜伏特务纷纷专程前来“谒见”,尽心款待后奉上了早已准备妥当的各种材料。仅仅数天时间,陈泊就抓获了40多个潜伏的特务。

东方网 2014.3.23 文 / 沉舟

《红岩》中英雄原型的惨痛失误

读过小说《红岩》的人,都知道许云峰。然而,这位在敌人拷打下英勇不屈的英雄的原型,却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导致了整个重庆地下党全军覆灭……

急中出错不幸中计

许云峰生活中的原型是重庆地下党负责工运的书记许建业。化名杨清的许建业被捕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床下的箱子里,放着17份工人入党申请书和3份党内文件。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一心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看守陈远德发现了他的焦急不安,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

此时的许建业已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远德的假象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要陈远德快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对方会给他4000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信后悄悄拆阅,觉得这情报很重要,于是把信交给了上司雷天元。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手里。

徐远举一面派出大批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徐远举发现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产党员。

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按图索骥”,一逮一个准,先后抓走了17人(6人被枪杀)。

事态远未就此完结,狡猾的徐远举,当然知道如何从已经打开的缺口继续扩大战果。

惊心动魄的“多米诺骨牌”

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一起来志成公司找许建业。刘国定在前,一进门便被守候的特务挡住。志成公司的职工指称他常来找许建业,刘国定当即被扣押。随后涂绪勋探身进门,见势不对,便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斥责:“滚!滚开!”涂绪勋才得以脱身。刘国定被捕后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有保留地出卖了李忠良等,李忠良紧跟着供出了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两人很快相继叛变。

冉益智、刘国定(此二人即小说《红岩》中甫志高的原型)相继沦为叛徒后,为邀功竞争着向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抓捕地下党员,使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志、李文祥等上百人相继遭到逮捕。

徐远举因破坏《挺进报》和重庆地下党组织有功,得到重庆绥靖公署、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三家上司的奖励。

狱中悔恨数次自杀

1949年底,新中国已经成立,罗广斌在白公馆策反成功,组织19人越狱脱险。越狱成功后,罗广斌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报告中“切勿轻视敌人和严格进行整党整风”一条,主要便是针对党内领导同志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如由于许建业同志的疏忽大意,未严格遵守地下党工作的纪律,没有把17份入党申请书烧毁,直接导致17名工人党员被捕、6人牺牲,间接造成的损失则更为惨重。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当他看到刘德惠等人因他之故被捕入监后,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1948年7月21日,许建业在大坪劳工场被公开枪杀。罗广斌在同一份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对许建业的评价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就义贯长虹”。

《内蒙古日报》2014.3.26 文 / 佚名